

民众图书馆在我国近代图书馆转型中的指针意义*

张书美 刘劲松

摘要 我国近代教育经历了从培养精英人才到普及民众教育的转变。作为知识汇聚之地的图书馆,也历经了从嘉惠士林向教育国民的转型。在我国近代图书馆的转型发展中,民众图书馆具有指针意义。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民众图书馆对我国旧式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及管理模式进行革故鼎新,开启了近代图书馆普及化、通俗化、法制化及创新化等历史转型。民众图书馆所蕴含的平等、便利、主动服务理念,代表了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发展方向,对当下的基层公共图书馆治理不失启迪价值。参考文献 29。

关键词 民众图书馆 图书馆转型 中国近代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Public Librar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ies

Zhang Shumei Liu Jinsong

Abstract: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cultivating elite talents to popularizing educa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Libraries, as the place where knowledge gathers, have also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erving for scholars to educating common people. In the splendid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libraries, the public library has a guiding significance, because it not only opens up the innovation of the old library service concept and management mode, but also establishes popular, legal and innovative modern libraries.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convenience, and active service contained in the public library represents the bas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it still has an enlightening value for the current grassroots public library governance. 29 refs.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Modern China

我国近代教育经历了从培养精英人才到普及民众教育的转变。这一转变,以严复于1890年代提出的“开民智”为标志,以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为代表,盛行一时,为社会各界所重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普及民众教育正式成为教育宗旨,通过法律固定下来。教育部专门设立社会教育司,负责包括民众图书馆在内的社会教育事业。民众图书馆萌芽于清朝末年,兴盛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一种类型,以服务普通民众、提供免费阅览、活用图书、普及教育作为设立之旨归。新中国成立后,民众图书馆或裁撤或合并,渐渐淹没在历史尘埃之

中。民众图书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虽然存续时间较短,但种种开拓性的创举,使其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具有指针意义。

1 民众图书馆开启了我国近代图书馆服务的普及化与平等化

1.1 服务理念由嘉惠士林向教育国民转型

民众图书馆的根本目的是普及教育,这一观念在与其它图书馆的比较中产生。清末,我国出现了兴建公共图书馆的热潮,但这些图书馆依然

* 本文系2022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基金项目“阅读与启蒙:近代中国乡村图书馆研究”(项目编号:22TQ07D)成果之一。

沿袭着藏书楼供士子学者阅览的传统。一如陈训慈先生所言,“当初藏书楼之设,一般人目光仅及于已受科学训练的士子,后来改称图书馆,仍然如此”^[1]。在1910年学部公布的《图书馆通行章程》中,关于“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成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2]的条文即是明证。在学部的提倡下,云南等地创设图书馆时,也均强调保存国粹,以满足士子学者之需。对于这股由上而下的精英服务导向的办馆理念,时人谢荫昌首先表达了异议。他认为图书馆教育可分为培养学者和教育国民两种,“其最要关键,在使全国人士知图书馆之性能不属于学者教育,而属于国民教育”^[3]。

1912年民国肇建,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对于图书馆事业渐予重视。当时民治精神扩张,政府基于普及民众教育的需要,对民众图书馆尤加注意。1915年,教育部除颁布《图书馆规程》外,又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其第一条即为:“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4]。同年,陆规亮也在《通俗图书馆》一文中将图书馆分为两种:一为学者图书馆,专以研究学问为目的;二则为通俗图书馆,“有特殊之目的,予一般人民之便益、开通社会智识者也”^[5]。1923年,龚楚书进一步提出了要对平民平等地施以教育,使平民有同受教育的机会,其最经济、最简便、最永久、最普遍的方式,即为推行通俗图书馆^[6]。自此,沿袭了数千年的服务“硕学士子”的陈规悄然发生转变,供公众阅览、为“普通民众”服务成为图书馆新的服务理念。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国民革命进入训政时期,对民众素质的强调成了当务之急,各种社会教育机关顺应时代潮流纷纷冠以“民众”两字。在此背景下,“民众图书馆”适时替代了“通俗图书馆”,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新思维,“自十六年以来,民众图书馆事业之进步,较任何其他类的图书馆为发达。虽其设备未能完善,而馆数则至足惊人”^[1]。民众图书馆既与通俗图书馆一脉相承,又有质的飞跃。“民众”代替“通俗”,不只是词汇的简单替换,而是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深

刻转变,民众成为图书馆的服务重心。其实,图书馆前是否冠以“民众”二字并不重要,其性质和使命是否为大众服务才是关键。民众图书馆普及教育的新思维,客观反映了我国近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的变化,代表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基本方向。

1.2 服务原则由区别对待向有教无类转型

清末民初,图书馆还未摆脱“重藏轻用”的藩篱,大多储藏高文典册以供文人学士参考,一般民众不能问津,图书馆成为特殊阶级享用的专利品。而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民众图书馆则坚持服务的平等性,以普通民众为服务对象,以使全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得到求知的机会为使命,“不收费的民众图书馆制度包含了一些促使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民众图书馆能提供无限的机会以实行这些原则。他不被任何权威者所辖制占有。他承认个人的自由以求个人的幸运。他不是离开民众独立的制度,也不仅为哪一个阶级服务”^[7]。徐旭也特别强调民众图书馆服务的全民性,“(它)是全体人民的图书馆,凡属圆颅方趾,不论其智、愚、贫、富、老、幼、男、女,均可进馆享受服务”^[8]。平等性可视为民众图书馆的首要特征,其无性别、年龄、程度、职业、贫富等差异的限制。不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贫富贵贱都有权利走进民众图书馆,“使未受教育者,得启发其智能之生长;使现受教育者,得辅助其智能之生长;使已受教育者,得继续其智能之生长”^[9]。

换言之,在民众图书馆中民众不会因出身、天赋、品行、财富的差别而被区别对待,他们的阅读权利也不会与其经济地位简单地划一等号。不管是腿脚沾着泥巴的农民,还是一天到晚看柜台的伙计,亦或是在工厂辛苦劳作的工人、家务缠身的妇女,在民众图书馆眼里,他们都是与学界政界人士一样的读者,都受到一样的欢迎。民众图书馆基于为民众平等服务的道德自觉,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实现底层民众的阅读权利,其平等服务的精神至为可贵。如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采用开架式服务,为附近827户近7000余人提供精神食

粮^[10]。此外,该馆还紧紧围绕办馆宗旨,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将图书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民众图书馆正是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我国近代图书馆服务原则由“区别对待”向“有教无类”平等化转型添上了浓墨重彩之笔。

1.3 服务范围由通衢大邑向基层乡村扩延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我国近代图书馆如雨后春笋相继在各地涌现。但这些图书馆大都设于通衢大邑,尤其是设在省一级地区,与基层民众有着相当大的隔阂。如1907年江南图书馆创设于江宁(南京),1909年山东图书馆创设于济南,1909年山西图书馆创设于太原,1910年广西图书馆创设于桂林等。这些设在通衢大邑的省立图书馆曲高和寡,对提升基层民众素质显得鞭长莫及。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他们整日为生计奔波,没有闲暇去遥远的都市图书馆读书。

乡村教育的普遍匮乏,使得农民长期处于困苦蒙昧状态。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近年以来,虽有平民教育,农村教育等等有利农民之运动,但皆局部改造耳,殊不知图书馆范围之广大,改造民众之入微也。是故欲养国魂,则非图书馆不可;而又非乡村图书馆不可。良以城市中之图书馆,犹如锦上添花;而乡村间之图书馆,实似雪中送炭”^[11]。在此背景下,一些先进社会团体,如中华教育改进社及中华图书馆协会适时提出“各县宜普设农村图书馆案”“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在乡村区域从速广设民众图书馆案”等议案,积极倡导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以提升农民素质。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社会各界的合力推动下,大江南北兴起了一股乡村图书馆建设热潮。应乡村教育匮乏而生的乡村图书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图书流通服务,在乡野大地播撒文化火种,使得以农为业的人们,能够自由获取农业常识及生活上所需要的知识,

“藉以提高农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社会,增加农业生产,使一般农民广被教化,洗雪文盲的耻辱”^[12]。随着民众图书馆的全面开花,我国近代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也出现了从通衢大邑到乡村基层的快速扩延。民众图书馆在推进全民阅读平等的道路上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助推了图书馆普及教育美好愿景的实现。民众图书馆服务向乡村的扩延和下沉,可视作为我国文化扶贫的先行探索,对当前新型乡村社会文化建构富于启迪意义。

2 民众图书馆开启了我国近代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通俗化及实用化

2.1 图书采访标准由个人喜好向博采众长转变

20世纪初,我国兴起了新图书馆运动。然而,刚刚成立的新式图书馆,虽然外在名称有了变化,但实质并没有真正从藏书楼中脱胎换骨出来。在藏书内容上依然禁锢于藏书楼的藩篱,所藏图书偏重于文化的保存,大都晦涩难懂。这些缺点使它远离民众,孤芳自赏。随着社会教育观念的兴起及传播,选择适应民众需要的图书就成为新式图书馆的必然趋势。近代,我国出版物渐增,各门各科丰富多彩,但大同小异的出版物也比比皆是。以教育国民为宗旨的民众图书馆,为充分发挥有限经费的效用,积极制定采选标准,以合理规避藏书楼式的主观性选择。

民众图书馆的采选依据主要有各方介绍、各种目录等。在各方介绍中,最重要的是专家介绍。如杜定友编著的《普通图书馆图书选目》,对民众图书馆的采选就极具指导意义,“从四部要籍及新出版品一万二千余种之中选出五千种,以供普通图书馆之置备。又选出次要者三千种及最要者一千种,以便各图书馆视其经济状况而定购置的先后。这对于新创办的一般图书馆,尤为便利。所选各书均以普通图书馆之需要及切合参考者为主”^[13]。时人陈豪楚对该书评价甚高:“所选之书,大抵偏重于各科原理之基本读物,故凡县立

图书馆、通俗图书馆,以及中学图书馆,均可各视财力以此为购书之依据。至本书于各类图书之分配,亦有足供各馆购书时之参考”^[14]。此外,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在开具民众图书馆书目方面也颇具经验,他主持编纂的《图书之选购》一书,有助于民众图书馆弥补“以选购之漫无标准,常使有限之金钱,耗之于不能有补实用之地”^[15]的缺憾。

其实,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目录编制与研究的传统。新图书馆运动兴起后,在传统目录学基础上又取西方目录学之长,各种目录学著作及实践成果层出不穷。一些机构特别是出版及藏书机构编制目录蔚然成风,如开明书店出版了《全国出版图书目录》等,这些目录或精到或广博,为民众图书馆的图书采选提供了可靠参考。总之,上述种种他山之石,对经费有限的民众图书馆来说极具借鉴意义。有效降低了图书馆采选图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其得以用最少的经济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有力地将图书馆藏书建设向规范化、经济化、效益化方向推动。

2.2 图书采访内容由高文典册向通俗实用转变

基于“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理念的旧式图书馆,将一般民众排在门外,成为特殊阶级的独享机关。“其重要事业在于搜罗高深图籍,乃至孤本旧槧。一般民众既够不上研究考证,而那时主持图书馆的人也不欢迎民众进来,……就是他们也还缺乏公家图书馆的习惯,所以甚至只是书籍保藏的一中心”^[1]。这种贵族式的图书馆充其量只能称作是“一所油墨纸张的堆栈”,对于普及民众知识、传授技能,没有太大益处。众所周知,一国之强弱,并不在乎造成少数的特殊人才,“乃在谋大多数人有一种相当的知能,使整个国家的文化提高”^[16]。而要谋大多数人素质的提升及国家文化的提高,不能指望几个收藏专深的国立省立图书馆,还得靠最接近民众、能为一般民众提供自由阅览的基层民众图

书馆。

国立、省立图书馆常常因其高端定位而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种隔阂,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对此深有体会,“本馆以性质偏近学术图书馆的关系,所以于汇藏既颇兼重专深著作”^[17]。而民众图书馆为了达到“教育千万国民”“普及国民教育”的目标,一改旧式图书馆的贵族特征,尽力采选内容通俗易懂的图书,以方便大众阅览。因为过于高深的图书显然不能引起知识程度不太高的普通民众的阅读兴趣,不符合国情民意。正如富济在《民众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所指出的,民众图书馆既以一般的民众为对象,就应搜集适于他们的有益图书,“并以最简单的方法,使一般民众得自由阅览”^[18]。

此外,民众图书馆在采选图书时也开始关注地域环境的影响。因为各地方的地域环境及风土人情不同,决定了各地民众需求图书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异。陈训慈先生就特别强调,民众图书馆的发展应接地气,应主动融入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除购置一般性之读物而外,对于各该地之特殊性读物,亦应酌为置备,故如吴兴为产丝之区,浙东为渔盐之乡,设在各该地之图书馆,即可就此方面之读物,多为选购,俾供社会各界之参考”^[19]。无锡泾滨民众图书馆购置图书时,即非常注重工商业方面的内容,因为该地工商业较为发达^[20]。通俗实用的图书采访方向,使民众图书馆更接地气、更受欢迎,有力推动了近代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通俗化转型。

2.3 图书分类编目由深奥难懂向直觉实用转变

民众图书馆作为近代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和新兴利器,对提高民众知识、增进民众技能、陶冶民众德性关系甚大。民众图书馆虽由多个要素组成,然与民众接触的则首在图书。图书馆藏是否适当、分类编目是否简明、民众应用是否便利等等与图书相关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民众的阅读体验。若图书分类适宜,对读者来说可以免去询问的烦恼;对图书馆来说则便于稽查、流通和指

导。民众图书馆为满足一般民众需要而设置,其图书分类法的编制自当呼应一般民众需要。民国时期,学者对民众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多有探讨。如朱英提出了纲目应趋简明、类名须贵适用、分类法须顾及编目等分类原则,“窃以中国之近状而论,社会民众,则以农工商界占大多数,政学他界则次之,故类名之拟定势必须注重多类农工商界民众之需要,若仅以高深奇奥,以炫其博,则一般程度低异之民众,亦将因无力辨识其需要之门类,而阻止其兴趣,或自动检测之能力矣”^[21]。

基于传统经史子集分类法及西洋分类法不符合普通民众使用的实际需求,著名民众图书馆学家徐旭根据“直知直觉、孰急孰缓、即求即得”三原则,创制了一套专门适用于民众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时人逸民对徐旭的分类法推崇备至:“民众图书馆不是为民众收藏图书,而是替民众活用图书,故民众图书馆之图书分类,应使程度低下之民众容易明了,检阅便利。依我的意见,县以下的民众图书馆(或民教馆图书部),因书籍数量不多,且少专门书籍,阅者对于图书类名更非十分浅显不易了解,故以采用徐旭之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较为适宜。这种分类法虽然类名过多,但名目浅显且甚通俗,民众一听明白,检阅便利。且类目无限制,尽可酌为伸缩,富有弹性”^[22]。基于实践经验,以直觉实用为特征、以便利使用为旨归的民众图书馆分类法,开启了近代图书馆分类编目由深奥向实用的转型,为充分发挥图书效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民众图书馆开启了我国近代图书馆治理的法制化及创新化

3.1 建章立制开启规范治理新篇

法治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趋势,图书馆事业也不例外。我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法治化的意义有深刻认识,如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曾指出“法制建设乃图书馆事业发展之基石”^[23]。他认为公共图书馆建设“首必有法律上之根据,或受法律之许可。关于设立图书馆之规定,多载在各

城各省各国之典章宪法,……既有法律根据,图书馆从而基始”^[23]。民众图书馆也深谙此道,对建章立制颇为重视,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开启了基层图书馆的规范化治理路径。现存较早关于民众图书馆的组织法规为1928年公布的《上海特别市市立民众图书馆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上海市市立民众图书馆只设管理员一人,所有事务都要听命于市教育局,“本馆各种事务暂不分股”^[24]。1930年公布的《吉林省民众图书馆办法大纲》,对于民众图书馆组织机构的设立,与1928年的上海民众图书馆条例相比,依然没有很大变化。

随着民众教育的深入及民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述粗放型的组织管理已不能适应民众教育的需要,精细化方向成为民众图书馆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该馆“设主任一人,馆员4人,书记1人,办理全馆事务”^[25],并设立总务、编藏、阅览三部。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县立图书馆组织暂行规程》,对民众图书馆的组织管理有着更为细致的规定。不但人事构成进一步明确,而且机构分工进一步细化,这些都为民众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的发挥奠定了法规基础。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民众图书馆尽管身处基层,但并未因此而降低对馆员的选聘要求及待遇保证,特别制定了相关细则予以保障。如《江苏省各县县立图书馆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江苏省各县县立图书馆馆员聘任及待遇暂行规程》等的出台,对民众图书馆选聘合格人才、保障馆员队伍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洪有丰所言:“薪金表之规定,大有助于工作之稳健,使薪金以级而升,则人乐于服务而鲜他迁之思”^[26]。民众图书馆的建章立制规范治理,为我国当今基层图书馆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3.2 开架陈列创新开放治理模式

封闭性是旧式藏书楼的重要特征。在古代,“学在官府”“官守其书”是常态,贵族统治阶级之外的广大民众与图书无缘无份。明代著名的澹生堂藏书楼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子孙能读者,则

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递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毕则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27]。虽然,在中国古代也出现了以周永年、国英等为代表的先进藏书家,他们提出的“天下万世共读之”“变天下无用之学为有用之学”等先进的藏书开放思想,已经超越了其时代局限性。但开放部分藏书并不等同于开放型图书馆,前者是在有限范围内的开放,后者则是面向全社会提供公开免费阅读。

民众图书馆就是这样一种彻底打破封闭性、施行高度开放治理的社会教育机关。它有着学习上的自由性,民众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而且可以自由进出书库选择图书。民众图书馆实施开架陈列便利民众自由阅览的举措,免去了民众检查卡片或目录的麻烦,给予读者自由阅览图书的权利和舒适便捷的阅读体验。民众也在畅游书海中触类旁通得到意外的收获,而平添许多的阅读兴趣。闲暇时涌往民众图书馆阅读,逐渐成为城乡民众生活的新风尚。如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鉴于图书馆收藏图书以供民众利用的原则,改行开架阅览便利民众,“实行以来,统计结果,阅览人数,较前已觉增多”^[28]。民众图书馆推行的开架陈列开放治理模式,是我国近代图书馆藏书开放思想的生动实践,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3 开展馆外流通创新服务模式

论图书之精美,民众图书馆比不过私家藏书楼;论图书之宏富,民众图书馆比不过国立、省立图书馆。但若论服务范围之广、受众数量之多、服务成效之高,民众图书馆却又在私家藏书楼及国立省立图书馆之上。原因就在于其兼具“平等性、活动性、通俗性、自由性”等特征,主动呼应时代之需,积极谋求服务创新,一改馆内守株待兔式被动服务,积极向馆外流通服务转型。“民众图书馆不是静的储书之所,而是动的流通图书的中心;不是被动的应人之需,而是自动的设施教

育;不是一部分知识较高者的消闲之所,而是广大的社会全民的受教育场所”^[15]。

民国时期大多数民众整天疲于生计,能来馆闲读的很少,这就造成了“图书”与“读者”之间存在着隔阂,“图书当然是期待读者的享用,读者也正在要求着‘图书’的救济;而在这两者之间,往往缺乏一种有效的媒介,以谋读者与图书的结合”^[17]。民众图书馆积极推出的馆外巡回文库、流动书车、通信借书等流通服务,主动把图书送到民众身边,可谓是把图书与读者链接起来的有效媒介。此举不仅为民众带去了精神食粮,也使馆内静止的图书活用起来,“他们(民众图书馆)现在的事业,不仅只谋求本身之发展,而且为提高读者兴趣,普及阅览,对于推广事业甚为致力”^[1]。如抗战时期重庆北碚民众图书馆推出的山间提篮送书服务^[29],正是民众图书馆开展流通服务的生动实践。这些都标志着我国近代图书馆已经改变了沿袭已久的消极被动服务惰性,积极主动创新服务模式,多措并举开展便民化服务。

4 结语

我国近代以前的图书馆只重保存典籍,而不重民众阅读。图书馆的作用,对一部分的人士是有补益,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其教化力所及,极近距离,且极微弱”。民众图书馆作为我国近代图书馆的一种主要类型,既是普及民众教育的产物,又极大地推动了民众教育的普及,成为推动我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它以“全民共享、开化民智”为特点,对我国传统图书馆服务理念及模式进行革故鼎新,其所蕴含的平等、便利、主动服务理念,代表了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发展方向,对当下的基层公共图书馆治理不失启迪价值。

参考文献

- 1 陈训慈.二十年来我国之民众图书馆与其展望[J].教育辅导,1936(8/9):41-49.
- 2 图书馆通行章程[J].政治官报,1910(813):6.

- 3 谢荫昌. 图书馆教育绪言[J]. 奉天教育官报, 1910(50):51.
 - 4 通俗图书馆规程[J]. 教育公报,1915(8):15-16.
 - 5 陆规亮. 通俗图书馆[J]. 教育公报,1915(4):1.
 - 6 龚楚书. 一个关于平民教育的重要问题——创办通俗图书馆[J]. 青年进步,1923(64):17-18.
 - 7 Adams Love. 民众图书馆的行政[J]. 章新民译.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3(3/4):183.
 - 8 徐旭. 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M]. 上海:中华书局,1935:2-3.
 - 9 徐旭. 民众图书馆学[M]. 上海:世界书局, 1935:8.
 - 10 徐旭,等. 三年来之本院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J]. 教育与民众, 1933(9/10):1673-1711.
 - 11 李钟履. 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J]. 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2):123-180.
 - 12 孔繁根. 乡村民众图书馆设施之研究[J]. 民众教育通讯,1936(1):11.
 - 13 杜定友. 普通图书馆选目[M]. 中华书局, 1935:1.
 - 14 陈豪楚. 书评·普通图书馆选目[J].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4):2.
 - 15 陈训慈. 浙省民众图书馆改进的管见[J]. 浙江教育,1936(4):23-34.
 - 16 谢春满. 中国民众图书馆之改造[J]. 教育杂志,1935(7):257.
 - 17 陈训慈. 图书与图书馆——兼谈本刊的使命与范围[J]. 图书展望,1935(1):1-2.
 - 18 富济. 民众图书馆的理论和实施[J]. 大夏, 1934(2):113.
 - 19 陈训慈. 浙江全省图书馆概览序[J]. 浙江图书馆全省概览,1936(4):1-2.
 - 20 无锡县县立泾滨民众图书馆概况[J]. 无锡图书馆协会会报,1932(1):11-13.
 - 21 朱英. 对于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之刍议[J]. 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5(7/8/9):32.
 - 22 逸民. 怎样办民众图书馆[M]. 民众园地, 1932(2):14.
 - 23 李小缘. 公共图书馆之组织[J]. 图书馆学季刊,1926(4):610.
 - 24 大学院公报编辑处. 上海特别市市立民众图书馆暂行条例[J]. 大学院公报,1928(4):95.
 - 25 南京市教育局. 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组织规则[J]. 南京市政府公报,1932(5):74-75.
 - 26 洪有丰.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4.
 - 27 祁承火. 澹生堂藏书约[M]//吴晞.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2007:11.
 - 28 浙民教馆图书部行开架式[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2(5):27.
 - 29 张惠生. 一年来的民众图书馆[J]. 北碚月刊,1937(9/10):116.
- (张书美 研究馆员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劲松 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收稿日期:2022-05-11